

经济改革启示录

「忧患足以兴邦，改革方能强国」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巨大变化，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优越性，但它确实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体制缺乏生命力。它窒息了竞争和创新，劣化了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益下降，日益明显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当前中国

蔡昉著

十字路口上的抉择

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

的抉择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坚持既定的改革之路，增强综合国力，以便在世界激烈的经济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跻身于强国之林。本书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难点和热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大胆进行研究，给人以启示，力图探索在稳定中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召唤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体制。



《经济改革启示录》丛书

总 序

戴园晨 华 飞

春风吹拂，枝头又绿。1992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若干重大决策，激励人们高扬起改革开放的风帆，破浪前进，驶向胜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得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把经济一步一步搞上去，在讲求效益的基础上，加快赶超的速度。

多少年来，我们总有一些同志爱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持着穷革命、穷光荣的观念不放，还是摆不脱当年盛行过的“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的阴影，对于生产力标准，总觉得不够革命、不够踏实。其实，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百余年来中国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富强繁荣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 芜 铭

责任校对: 高 辛

封面设计: 朱 虹

版式设计: 木 子

十字路口的抉择

——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

Shizi Lukou de Jueze

蔡 方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大厂县印刷厂印刷

787×1024毫米 32开 4.75印张 81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04-1096-4/F·206 定价:3.50元

的新中国，使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和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这才是搞社会主义。一些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局顷刻发生巨变，有的一下子就垮了，其原因固然非只一端，但说到底，根本原因还是经济没有搞好，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不出来，老百姓不满意。中国之所以能够“风景这边独好”，则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不放，经济繁荣，市场活跃，人民得到了较多的实惠。两相对比，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还排得很后，经济发展的现状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差得很远。我们还得循着“忧患足以兴邦”的思路，增强忧患意识，扭住经济建设中心不放松，夹着尾巴向前跑，跑得比现在再快一点。

要跑得再快一点，就得改革开放。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的各种变化，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乏生命力，但它确实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体制缺乏生命力。它束缚了人们的手脚，窒息了竞争和创新，劣化了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益下降。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不改革或者只作一些枝枝节节修修补补式的改革，难以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必然会在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使人们感到失望，以致引发出人们看到的巨变。必由之路正意味着，不改革没有出路，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解放

生产力，才能使社会主义更加巩固和健康地发展。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正在做着的事情。

历史还启示我们，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传统体制不会轻易地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新体制的推进会遇到许多障碍和困难。这不仅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观念不更新很难正确评价和判断是非；而且体制的变动涉及到权力调整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动真格的便会使改革流于形式，动真格的则会因权力和利益的冲突而造成许多磕磕碰碰。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革命，那是一种只会葬送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加左派幼稚病的结果；而改革则确确实实是一场革命——它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前提，因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体制革命，因而能够避免对抗性冲突式的革命所可能造成的混乱与破坏，实现在稳定中推进革命，在稳定中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在稳定中建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使经济体制反映的各种经济关系得到合理调整。

历史还启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这表现在，国民经济本身是一个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各个子系统内部又是一个包括许多分支系统的网络。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各个经济细胞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中，形成了相互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传统经济体制中盘根错节的制度体系。因而，在改

革初期推出某几项单项改革，可以见到效益、扫到浮财，而当体制改革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要继续深化，便得把改革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对待，使改革配套协调，避免整个系统的剧烈摩擦。传统体制的整个体系，像连环套那样一环套一环地缠结着，不可能靠单项改革的突破和撞击反射来改变整个体系。所以，在大步推进改革时，也要像解开九连环那样，对庞大的经济系统的配套改革，有序地作出安排。

历史还启示我们，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同时，又正是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上述三个转换互为牵扯、互相影响，也需要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协调。我国传统的数量型、外延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作为一种启动经济发展的战略，确实推动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数量型、外延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有不断的大量的投入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会形成投入不断增多而产出相对下降的趋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供给虽有增长，但投入增长幅度大于产出增长幅度，从而形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封闭循环，使得总需求膨胀成为传统发展战略难以摆脱的伴生物，也使得“软预算约束”和“投资饥渴症”成为传统经济体制的顽症。因此，发展战略亟待转换。而发展战略转换需要与经济体制转换相协调。协调了则彼此促进，不协调则彼此掣肘

牵扯。还要看到，我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等，都处于转换变化的过程之中。然而，每一种经济结构的形成都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决不是哪个个人的主观意志可以随意左右的，但同时它又不是纯粹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是由多种力量相互交织而产生的合力推动其形成和演变的。从我国近年来的状况看，经济调整追求的目标，原本是使结构优化，但由于传统经济体制中缺乏促使存量调整的机制，扭曲的价格形成的利益导向，不仅没有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反而仍然制造着失衡；不允许失业的政策前提，也使得产业结构存量调整机制无从建立。这样，供给结构因体制制约而处于超稳固状态，与收入增长形成的消费结构变量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城市住房等项消费还是福利型的，又使得需求领域相对狭隘。从上面所举的事例来看，体制的变革将会引起供给、需求等方面经济结构的变革；经济体制转换和经济结构转换如何方能协调推进，也需要在深层次研究解决。

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当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形成之后，一方面在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加速工业化方面显示了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令人为难的商品短缺与商品积压并存、效率普遍不高等问题。当时，有人想借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波兰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则提出了有名的模拟市场的“试错法”，即由计划机关制定价格，如果不能

使供需协调，可以采取“错了再试”的办法，使之逐步逼近由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从而保留“价格的参数作用”。这使得奥斯卡·兰格成了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改革而自我完善的思想家。如今，我们迈出的步子已经比兰格的设想超出了许多，已经从“模拟市场”转向了建立实实在在的市场，开展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系统改革。然而，从改革的进程来说，虽然当理性思维已清楚地意识到了某些方面的明显缺陷，但在试图改变它时，却往往会遇到主观意志和自然选择多种变量相结合时的判断困难，以致有时仍不得不用“试错法”来证明我们每一项具体决策的正确与否。我们曾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经过1988年以来的曲折历程，我们更加感到，当改革的春风再次吹绿大地的时候，有必要回过头来审视已走过的改革历程，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并使之上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理出一条线索，以摆脱那种依赖“试错法”走走看看的近乎于原始的改革方法。

上述设想，几年前早已有之。起初只是面对着深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与困难，想对所处困境作一综合性研究。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愈加感到，改革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于是，我们开始把眼界放到了对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所需要的条件及其可能产生影响的诸多“热点问题”上，并特别对问题的结节点进行了专题性分

析。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们抓紧了这套《经济改革启示录》丛书的写作和修改，形成了目前的格局。

《经济改革启示录》丛书是由经济学专家写给非专家读者看的书，经济专业的读者也会从中获得新的感受和新的启示。

参与这套书撰稿的，有久享盛名的经济学家，但其主力则是一群具有良好经济理论修养的青年经济学博士。在经济学界前辈的参与和指导下，他们欣然命笔，努力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所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建树。

《经济改革启示录》丛书具有与以往经济学著作不同的鲜明特色：其一，它具有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特点，即在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时，努力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上，强化经济研究的哲学意识，努力开创经济哲学之先河。其二，它具有基本统一的学术倾向和写作风格。在丛书成书的过程中，曾几经讨论和协调，统一思想，努力使丛书成为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因此它决不是临时拼凑的拼盘式的应时之作，而是在一个理性目标模式之下反复琢磨的理论精品，并具有明显的建设性特点。其三，它具有大众读物的特点，是大众化的社会科学通俗书籍。参与本丛书写作的作者，并非都是语言学专家，也并非都受过通俗化、趣味化写作的严格训练，但他们确在这方面尽了力。每本书各章的提要，也是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情趣而特地编写的。

我们希望这些努力能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编写《经济改革启示录》丛书，旨在为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献计献策。对丛书编委会来说，这是一项新的事业。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将不断选择一些经济热点和难点，分期分批地组织选题，不断地奉献给读者。我们殷切希望热心读者读了这套丛书后提出宝贵意见，以帮助和推动丛书编委会更好地组织编好这套书。

1992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第 1 章 农业改革的十字路口 | (5) |
| 1.1 对比的启示和警告 | (5) |
| 1.2 人民公社与“免费搭车” | (12) |
| 1.3 第一步改革的政策效应 | (19) |
| 1.4 踟蹰的第二步 | (31) |
| 第 2 章 农业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 | (43) |
| 2.1 传统农业体制的形成 | (44) |
| 2.2 传统发展战略的惰性 | (57) |
| 第 3 章 改革呼唤目标模式 | (66) |
| 3.1 跨世纪的挑战 | (67) |
| 3.2 改革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改革 | (75) |
| 3.3 双重的改革要求 | (78) |
| 3.4 计划与市场：结合点的选择 | (85) |
| 第 4 章 规模经济与经营规模 | (95) |
| 4.1 农业中规模经济的层次性 | (96) |
| 4.2 农业中组织形式的选择 | (104) |
| 4.3 家庭经营的生命力 | (108) |

前 言

过去十年，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要算“改革”和“发展”了。不单是这两个词反复不断地见诸于报章杂志，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其改革和发展的实绩也使全世界瞩目，值得中国人引为骄傲。然而，成就固然是巨大的，但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尚远。今后十年，改革和发展决不能止步。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接受某些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警告，还应当把另一个词——“生存”，与“改革”、“发展”并列，即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争得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我们面临的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更为艰巨。

把“生存”这个词喊出来，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我们目前的生存空间与我们的生产能力仍然是不相适应的。就拿关系人民穿衣吃饭的大事业——农业来说，资源的约束越来越紧。我国目前的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总面积的 6.8%，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 21.8%，人均耕地仅为 1.5 亩左右，与世界平均 3.96 亩的水平相比低 62%。而

且，人口仍在以 1.4% 的速度增加，耕地也继续会以 0.5% 左右的速度减少，人与自然资源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生存”的概念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人所谓的生存绝不可能以人类祖先的那种茹毛饮血式的生存为满足。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要求我们迅速地从“温饱”进入“小康”的生存水平，及至追上发达国家的生存水平。目标的宏大与资源的制约构成矛盾。此时我们向全体人民提出生存的问题，是为了增强人们的紧迫感，增强人民的挑战意识。

人类在一万多年以前创造了农业这个产业以后，人的生存就已经不仅仅依靠向自然界索取，而是利用工具和间接资源，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进行交换。经过原始农业、传统农业，进入现代农业阶段以后，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大降低，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本身素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了寻找生存之路，人类需要开发和利用新的经济资源——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更好地生存的愿望，必然提出发展的要求。

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是依靠科技进步实现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的转变。我们以较少的土地养活了较多的人口，这无疑是对全人类的一个伟大贡献，但我国目前农业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拿粮食的单产水平来说，1989 年荷兰小麦的单产水平比我国高 2.49 倍，澳大利亚的水稻单产水平比我国高 1.44 倍，美国的粗粮单产水平则比我国高 10.5 倍。这是过于巨大的差距。缩小这个差距的必由之路就是引导农业发展的各方面

参加者创造出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例如，引导农业科技人员更多更好地开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引导农民更快地应用新技术，引导各行各业都大力支持农业，引导农业直接生产者投入更多的有效要素。

但是，这种引导要有一种机制。过去靠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维持的农业经济，其正常活动的效率是低下的，各个方面都没有积极性。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唤起了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但迄今为止，尚有一系列的关系没有理顺，因而发展受到了阻碍。

生存的要求和发展的要求，都来自于最直接的现实，而改革的要求虽则也来自于经济生活现实，但改革的取向则不像前两种要求的取向那样显而易见。而人们一旦把理想付诸操作时，改革便显得处处棘手，甚至连目标也变得扑朔迷离了。也许需要对改革作一个较为恰当的定义。有人认为改革就是制度创新——这把改革一般化了。其实，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中，处处都遇到制度创新的问题，而改革是特定时期的一项特别事业。在经济生活中，当事人总是通过对成本、收益作出估算之后，采取一种可以使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这里的当事人可以是生产者、管理者，也可以是社会服务组织或政府机构，他们的效用函数可能包含经济收益，也可能包含政治和社会的取向，如追求社会安定等目标。依据一定的信号，追求目标最佳化而选择和创造的行为模式，就是所谓的制度创新。

制度作为一种能够给生产者带来节约或经济收益的要素，与技术一样，是由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诱致产生的。例如，土地资源的稀缺会诱致产生土地节约型的农业技术和耕作方式。正确的信号无疑会诱致出正确而合理的技术与制度创新；扭曲的信号也会诱致出创新反应，但结果则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90年代的农业发展要求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这就需要加强技术的和制度的创新。但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有一系列的信号是扭曲的。例如，产品价格信号是扭曲的，不能准确地反映产品的供求。包括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等等，要素价格是扭曲的，不能真实地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当程度的稀缺性，包括土地无价无租，利息率偏低，劳动力流动不充分等等。把各种影响技术和制度选择方向的扭曲信号矫正过来，就是改革的任务。可见，经济改革是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前提，创新又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则是生存的保障。

这本小书就是力图以发展为主题，来探讨农业经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本书虽然吸收了同行们的许多观点和材料，也仅能算作一家之言。抛砖引玉，希望有关的讨论更活跃、更深入。

第 1 章

农业改革的十字路口

提要:“民以食为天”。中国农业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进一步的改革是否能成为农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已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关注的焦点。在需要作出理论判断和政策选择的十字路口上,再次反思传统的农业经济体制,回顾第一步农业经济改革,评判第二步改革探索的得失,不仅可以坚定我们把农业改革推向深入的决心,也有助于我们探寻正确的改革方向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

1.1 对比的启示和警告

本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并且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这场改革发端于农村,八亿农民打破了生产队集中劳动、统一经营的旧模式,创造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业经营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产生了巨大的改革效应。

农业增长的推动力是技术进步和投入增加。常规的农业增长速度是在正常的技术进步速度和投入增加速度下取得的。但技术进步和投入增加的速度有时会由于各种外部力量的干扰而加快或减缓。这种干扰因素包括技术的重大创新、新投入要素的发现、新制度的产生，以及与此相反的情形。农村改革创造了更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制度形式，从而使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投入要素总量增加、投入物利用效率提高，进而产生了所谓改革效应。这场农村改革的成果是多方面的，既可以从经济总水平的提高方面来观察，又可以从其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来总结，还可以从其触发的城市经济改革的启动效果方面来分析。其中，最直观的成果是改革造成了农业投入水平、农业总产量、商品产量、单产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迅速提高。把改革前后的这些方面进行比较，足以加深我们对改革效应的理解。^①

1979年以前，农业经济体制保持着典型的旧体制特征——生产队统一经营、集中劳动；80年代前4年，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推行的时期；1984年底，全国已有99.0%的生产队、96.6%的

^①许多研究表明，造成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农业体制的变革，价格调整在第一步改革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这里主要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确立作为改革的主要标志。（参见麦克米兰等：《中国经济改革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政治经济学杂志》，1989年；林毅夫：《家庭责任制实行后中国农村的要素市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1988年4月）